

#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 演化的逻辑<sup>\*</sup>

余博闻

**【内容提要】**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主要由治理愿景、治理方法论和治理理论三个子系统组成，具有实践性、学理性和价值性三大特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由实践反馈机制、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三大机制驱动。实践反馈机制能够直接检验治理理论的有效性，并为理论创新提供素材。学理思辨机制依靠论辩、思想引进和综合等方式影响治理理论创新的方向。权威重构机制则通过重新构建全球治理权威来推动新治理愿景和新方法论的产生，进而影响治理理论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地位。实践反馈和学理思辨这两个反思性机制需要以权威重构机制为中介才能对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产生影响。反思性机制可以直接对全球治理理论进行塑造，而权威重构机制驱动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变革可能会使治理实践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对全球治理理论产生塑造效应。以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为案例，作者梳理了从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到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演化过程，探究该议题领域内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进入 21 世纪，全球南方国家除了在国际发展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外，还在治理理论建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关键词】** 知识体系；全球治理；国际发展治理知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 余博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5) 12-0024-24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国际组织成长的动力模式与中国的引领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4BGJ02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引言

全球治理是一项知识密集型事业。全球治理的要义是通过制定规范、规则和具体政策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进而促进全球性公共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个进程中,规范、规则和政策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知识体系能够通过高等教育、科研文献、学术团体、相关平台和政策咨询等多种渠道影响全球治理的政策制定者(如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官员)的思想,进而指导其实践。<sup>①</sup>如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治理方面的教育和科研,并被操作化为世界银行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促进方案。因此,要推动国际发展治理体系实现变革,除进行国际制度改革外,还需要提出一套新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

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全球治理变革问题展开了诸多有价值的探索,分析了正式国际制度和宏观理念变革的原理,并讨论了中国的治理实践。<sup>②</sup>然而,既有文献较少分析隐藏在制度和话语背后的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变革问题。中国学者聚焦自主知识生产问题,重点讨论了政治学、区域国别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路径和现状等议题,<sup>③</sup>但这些研究多以描述、号召和展望等方式从纯学理的角度讨论知识体系的应然状态,关注的是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基础概念和理论,没有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逻辑进行深入分析。虽然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演化密切相关,但这种演化往往发生在全球层面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价值性,因此也包含了学理维度之外的动力机制。鉴于此,本

<sup>①</sup> Jeffrey M.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②</sup> 参见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9—39页;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8—57页;陈志敏:《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第8—10页;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75—105页;孙吉胜:《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1—22页;Phillip Y. Lipsky, *Renegotiating the World Orde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ichael Zürn, *A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Authority, 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up>③</sup> 参见周文、白信:《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遵循与理论再造》,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第18—28页;赵可金、尹一凡:《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64—76页;任勇、朱友伟:《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54—65页;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载《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第10—18页。

文首先梳理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特征，然后对与知识生产和演化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做了简化和组合，尝试提出一个指导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通过追踪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历史来展示本文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 二、相关研究评述

对全球治理宏观理念要素变化进行分析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演变理论。规范的演变不同于正式制度变迁，一般依赖争论、说服和学习等话语性机制。<sup>①</sup> 规范理论的研究者尤为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范的实践，强调霸权话语的虚伪性会激励规范创新，而崛起国将利用本土文化建构新话语体系来挑战霸权话语的正统性。<sup>②</sup> 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式全球治理宏观理念的内涵与传播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等议题。<sup>③</sup> 但既有研究多以总结中国理念的内涵和描述相关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对理念演化背后的复合动力机制缺乏理论提炼，其研究对象也未涵盖整个全球治理知识体系。

近年来，学界逐渐开始重视知识对全球治理实践产生的影响。有学者对知识传播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sup>④</sup> 还有学者强调应以批判性眼光审视一些行为体对知识的垄断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对概念、标准和最佳治理实践的定义权，审视其因掌握控制权而产生的权力效应。<sup>⑤</sup> 相较于研究宏观理念和话语的文献，既

<sup>①</sup>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刘宏松、吴桐:《国家间论辩、关键节点与国际制度改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4—30页。

<sup>②</sup>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72; Amitav Acharya,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1, 2011, pp. 95-123.

<sup>③</sup> 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21—41页;郭树勇:《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23—50页;孙吉胜:《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1—22页;吴志成、李冰:《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4—21页。

<sup>④</sup> 徐佳利:《知识分享、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126—154页。

<sup>⑤</sup>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eds.,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Olivia Serdeczny,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Use by Developing Country Negotiators in Loss and Damage Negoti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3, No. 3, 2023, pp. 12-31; Annabelle Littoz-Monnet and Juanita Uribe, "Methods Regime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Making in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7, No. 2, 2023, pp. 1-22; Hans Krause Hansen and Arthur Mühlen-Schulte, "The Power of Numb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2012, pp. 455-465; 陈雪莲:《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结构性权力竞争——以专业性国际组织 FATF 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9期,第11—22页。

有研究更加聚焦专业性全球治理知识，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但这些研究只是将知识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没有探究驱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这一问题。

有学者讨论了全球治理知识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如赵可金指出，由于西方全球治理知识的狭隘性、局限性和失效性等原因，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革新势在必行。<sup>①</sup>也有一些学者总结了国际发展治理领域内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知识的内涵、价值和影响，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演进历史、西方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新知识进行了梳理。<sup>②</sup>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发展知识的扩散问题，强调知识扩散的渠道主要体现为跨国间的政商互动。<sup>③</sup>在气候与金融等议题领域，有学者提出非西方知识的生产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知识”的结构性制约。<sup>④</sup>虽然既有研究都初步涉及全球治理知识演化议题，相关学者也零散地论及知识演化的动力和制约因素（如传统知识的失效、结构性权力等），但这些研究重在对不同知识进行辨析、批判和历史叙事，在谈及非西方知识时多以归纳和描述为主，并未系统化分析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逻辑。虽然有学者强调了科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sup>⑤</sup>但只是将知识作为话语权建构的一个环节，没有区分不同的知识类型，也未清晰讨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互动关系。还有学者讨论了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国际组织生产知识的类型，但其关注的重点是国际组织行为模式的差异，缺少对知识体系自身演化问题的分析。<sup>⑥</sup>

本文对知识演化的逻辑进行了理论提炼，对相关驱动机制进行了区分与组合，尝试构建一个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将国际发展治

① 赵可金：《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危机与重建》，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第176—191页。

② 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6—94页；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孙吉胜：《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2期，第4—31页；崔文星、黄梅波：《“全球发展倡议”的理论超越性——基于与“西方发展主义”的对比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5期，第38—60页。

③ 陈兆源、李晨阳：《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8—39页。

④ 李昕蕾：《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4期，第32—70页；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与中国策略》，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124—152页。

⑤ 李昕蕾：《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4期，第32—70页。

⑥ 汤蓓、扈赫扬：《制度环境与国际组织的知识生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6期，第128—155页。

理知识体系作为案例，论证和展示了实践、思辨和权威逻辑推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内在运作机制。

### 三、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及其演化动力

要厘清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首先应在理解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特性的基础上，将知识生产的一般性动力机制与不同类型的知识结合起来分析。本文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分为治理愿景、治理方法论和具体治理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由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具有复杂性，因此其演化进程也必然是一个多机制驱动的系统性工程。鉴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推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在组合模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 （一）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特性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的总和。知识的表现形式包含符号、概念、话语和原理等，并以书籍、文章和政策文件等为载体。知识体系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既有知识进行整理的集合，是根据某种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的系统知识，是知识的逻辑化和体系化的结果表现形式。<sup>①</sup> 按照对知识体系的概念推演，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是为解决特定全球公共问题而开发的概念、理论和规范性认识的集合。在分析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构成时，有学者遵循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分法指出，本体论包含了对全球治理本质目标、治理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的认识，认识论是从学理上理解和认识全球治理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则是全球治理的中层理论。<sup>②</sup> 这一分析较好地展现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多维性。但从全球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全球治理是以定义问题、设定规则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持续进程，且该进程还涉及如何处理权威施动者与接受者的关系，<sup>③</sup> 因此全球治理知识需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深度结合。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必须能够回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78页；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14页。社会学理论将知识分为表象知识和背景知识，但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主动和有目的性的知识生产，因此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所提到的知识皆为表象知识。参见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2, 2008, pp. 257–288.

② 赵可金：《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危机与重建》，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第176—191页。

③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0—32页；David A. Lake, “Rightful Rules: Authority, O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3, 2010, pp. 587–613；Deborah D. Avant, Martha Finnemore and Susan K. Sell, eds., *Who Governs the Glob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答全球治理实践中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治理，二是治理实践的组织原则是什么，三是治理目标如何实现。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全球治理实践对知识的要求构建了一个新的三分法：一是把本体论概念中关于全球治理本质目标的要素抽离出来，将其单独作为治理愿景的维度。二是把原本被归于本体论的对治理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的认知归为方法论。由于这类认知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更接近治理实践的组织原则，因此可以在具体的治理方案设计与选择方面提供方向性指引。三是直接使用治理理论的概念来定义与治理实践紧密相关的理论知识，避免在研究中将方法论等同于中层理论而产生歧义。通过这样的重组可以进一步厘清不同知识元素的差异性，减少概念外延的重叠和概念歧义，进而更紧密地与全球治理实践进行结合。下文将以定义和示例相结合的方式，逐一讨论和分析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治理愿景、方法论和治理理论。

第一，描绘全球治理愿景的知识主要包括旨在展现全球公共产品充分供给和全球问题得以（阶段性或局部性）解决的概念、话语和指标。在一个成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这些概念、话语和指标往往以大国、重要国际组织或多边平台的政策文本为载体。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关于净零排放和升温控制目标的表述等就是这类知识的典型例子。治理愿景之所以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行具有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全球治理愿景能够对行为体进行政治动员并引导它们的努力方向。<sup>①</sup>

第二，方法论一般是指研究者对科学标准和事实判定原则的认识，可以为具体的方法选择提供指导。<sup>②</sup> 结合对全球治理现实情况的观察，全球治理的方法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全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组织原则，二是在进行理论建构和形成治理方案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适当原则。在实践中，全球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等级式关系，以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中的援助者—受援者关系为代表；二是主体间相互平等和包容的关系，以气候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代表。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经常采用二元思维来理解国际事务，这种二元思维如果被应用到全球治理理论构建和方案产生的过程中，就会形

<sup>①</sup> Norichika Kanie, et al., "Introduction: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Goal Setting," in Norichika Kanie and Frank Biermann, eds., *Governing Through Go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s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MIT Press, 2017, pp. 1-28.

<sup>②</sup> Vincent Poulio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成一种基于自我想象且居高临下的“开药方”式治理方法论。<sup>①</sup>相较于西方国家的二元思维，中国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遵循平等协商、包容多样性的原则，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式二元思维的全球治理方法论。与治理愿景一样，方法论也主要以概念和话语形式出现在各类政策文本中。

第三，与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不同，治理理论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命题，一般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特定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因果机制，二是对达成治理愿景的路径推理。<sup>②</sup>典型案例主要有国际发展促进理论、气候治理理论（如碳定价、碳锁定和复合治理理论）<sup>③</sup>以及金融危机的应对理论等。治理理论通常出现在学术文献中，但要在全局治理实践过程中发挥影响，该理论必须被权威机构的政策文件吸收或采纳。例如，新自由主义发展促进理论最初出现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文献中，随后才被融入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文本。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具有价值性、实践性和学理性的特点。首先，从全球治理追求的长远价值来看，全球治理应重视平等、协调和合作等治理理念，强调权威应在多元主体间进行分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仍然较多地反映了特定权威所有者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实际上，这也符合哲学学者对知识与权力间关系的认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sup>④</sup>在全球治理中，关于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知识与权威所有者的联系非常密切，因为治理愿景和方法论能够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且不易被实践检验。其次，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尤其是治理理论必然会与全球治理实践紧密相连。全球治理理论有转化为政策指南的倾向，那些经实践证明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知识最终必然遭到淘汰。<sup>⑤</sup>最后，全球治理主要由众多专业议题构成，与之相配合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全球治理知识尤其是其治理理论不能只是概念的简单罗列，而需要成为“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而这又需要“以坚实的

① 赵可金：《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危机与重建》，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第189—190页。

② 王心怡、孟天广：《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2期，第13页。

③ Steven Bernstein and Matthew Hoffmann, “Climate Politics, Metaphors and The Fractal Carbon Trap,”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9, No. 12, 2019, pp. 919–925.

④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

⑤ Vincent Pouliot and Jean-Philippe Thérien, “Global Governance in Practice,” *Global Policy*, Vol. 9, No. 2, 2018, pp. 163–172.

理论分析和论证的逻辑展开过程”。<sup>①</sup>

## （二）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动力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总是处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某种知识体系居于主流地位必然有其限定的时空条件，会不断受到检验、批判以及来自新知识的挑战。当然，知识体系的演化并不意味着该知识体系所有的构成要素会被彻底重构，其演化过程往往是渐进和曲折的，很多时候只是体现为某些知识元素发生的变化。结合全球治理知识的特征并综合各种一般性的知识演化理论，可以构建出一个包括实践反馈机制、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三种主要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这三种机制分别源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实践反馈机制提炼自科学哲学理论和建构主义的认知演化理论，学理思辨机制来自建构主义的知识共同体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演化原理，权威重构机制则是对国际秩序观转型理论和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践总结。本文认为，由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由不同类型的知识组成，因此推动该知识体系演化的主要动力及相关机制也不尽相同。

### 1. 实践反馈机制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实践是指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以及开展相关治理行动以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活动。实践是检验知识适用性的主要标准，也是知识生产的动力。一方面，负面实践反馈可以激发知识创新行为。在科学哲学文献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虽然在不同范式/研究纲领的不可通约性和变革程度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强调客观经验对理论的检验作用。<sup>②</sup>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客观经验一般是科学观测得来的数据。由于全球治理知识除了被用于解释已经完成的实践，还被用来指导实践，因此对全球治理知识的有效性检验往往表现为该知识被融入全球治理实践后能否产生与理论描述相符的全球治理绩效。<sup>③</sup>知识和实践以共同体为载体，共同体也是知识的评判者。在全球治理语境下，共同体一般由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以及由研究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构成。当代实践理论和认知演化理论强调，实践反馈在打破共同体内固有认知结构方面具有关键意义，即负面的实践绩效会导致期待与结果的不协调，

<sup>①</sup>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7页。

<sup>②</sup> Thomas C. Walker, “The Perils of Paradigm Mentalities: Revisiting Kuhn, Lakatos, and Popp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 2, 2010, p. 437.

<sup>③</sup> 余博闻：《“场所转移”与国际规则改革：动力和制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4期，第104—106页。

由此产生了不确定性和知识危机，进而推动共同体对知识体系的质疑和反思。负面的实践绩效既可以是明显的治理失灵，也可以是实践者经由跨共同体体验而产生的认知冲击。<sup>①</sup>

另一方面，实践对知识演化产生的作用还表现在实践为知识创新提供知识素材方面，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实践不断促进背景知识成为共同体的集体知识，<sup>②</sup>这种背景知识在常规状态下往往会隐藏在认知帷幕之后，但可以被专业研究者有意识地进行归纳、抽象化和理论化，从而产生“激活背景知识”的效应。<sup>③</sup>其二，在知识危机下，一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且较为零散的知识以及另一些来自其他共同体的已有实践经常被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共同体用来再造新的知识。<sup>④</sup>其三，危机中的共同体可以先采取临时性应对行动，然后再将这些权宜之计提炼成新知识。<sup>⑤</sup>总之，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多源流的综合与吸收过程，其包含了借鉴外来实践、将外来实践与共同体实践融合再造的过程，进而实现“知识涵化”。<sup>⑥</sup>

虽然实践反馈机制是推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强大动力，但其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反馈机制通过对照实践绩效和知识来推动反思，这就要求知识必须是可检验的，即检验过程需要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推论以及可测量的标准。因此，实践反馈机制的理想作用对象是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等知识是弹性和模糊的，因此这些知识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证伪性，也难以被实践检验。因此，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可能会规避、延缓或弱化负面实践反馈带来的冲击。例如，新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等宏观理念是西方国家构建全球治理方案的逻辑起点，尽管西方国家提出的治理方案和具体理论在发展、金融和气候等议题中不尽相同，但这些理论所遵循的宏观思想是共通的。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与全球治理愿

① Jacqueline Best, *Governing Failure: Provisional Expertis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 Christian Bueger and Frank Gadinger,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New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32; 跨共同体实践引发知识变迁的典型案列，参见徐秀丽：《从受援者到援助者的知识自觉》，载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254页。

②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3, No. 1, 2011, pp. 1–36.

③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7页。

④ Sebastian Schmidt,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A Pragmatist Explanation of Norm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8, No. 4, 2014, p. 820.

⑤ 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⑥ 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3—24页。

景和方法论相关的全球治理知识所具有的弹性和适应性。<sup>①</sup>对于这类全球治理知识而言,唯有通过建构新兴权威主体和推广替代性宏观理念才能突破其垄断地位,但这超出了实践反馈机制的作用范围。实践反馈既不是推动理论演变的唯一驱动力,也不能直接决定理论演变的最终结果,原因有两点:其一,即便没有实践反馈,知识共同体出于纯学理的目的也能开展理论创新。其二,即便实践反馈冲击了传统理论,但对实践绩效的解读也是多样的。同时,基于归纳实践而直接产生的知识多是概念而非理论。概念是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纽带,理论则要讨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sup>②</sup>如果要将知识体系化,仅有概念是不行的,将概念串联起来进行理论加工是知识演化不可或缺的步骤,而这需要更加学理化和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机制。<sup>③</sup>

## 2. 学理思辨机制

受到高等教育和规范化学科训练的学者往往是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知识生产者。如在气候治理中,知识生产的主力是科学家团体;在金融治理中,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人士往往会与高校和智库合作进行知识生产。由于相关专家学者与国际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基本概念上达成了共识,也能共享学术实践活动经验,因此构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sup>④</sup>知识共同体既可以从实践中汲取知识,还可以通过参加纯粹的学理思辨活动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学理思辨是一个中性概念,包含具有革命性的论辩以及保守性的知识综合和修补两类学术活动。

一方面,知识共同体围绕理论关键要素展开的论辩有助于推动理论的演化。社会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社会科学理论只有放弃某些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才能获得理论的精简性。<sup>⑤</sup>因此,除出于更好解释实践的目的外,知识共同体推动理论演化的最直接方式是添加分析层次与变量,或者质疑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假定。如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化过程中,物质—理念之辩以及结构—行动者之辩都是理论

① 余博闻:《权力·话语·实践——全球治理深度变革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3页。

② 熊易寒:《概念的生产:在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载《理论月刊》,2024年第12期,第21—23页。

③ 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第22—25页。

④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p. 1–35.

⑤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ecial Edi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1998, pp. 29–46.

演变的重要动力。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表示，他们创造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一大方法就是“思维实验”，即观察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颠倒过来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新认识。<sup>①</sup> 除围绕关键变量的辩论外，概念和理论创新还可以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再造以及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来完成。<sup>②</sup> 虽然学理思辨机制和实践反馈机制经常纠缠在一起，但学理思辨机制在处理一些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验证的前瞻性问题时有可能独立于实践反馈而存在。在全球治理中，许多治理理论起初是通过思想实验或作为理想治理模型被提出来的，而这些理论被提出时，主流理论并不一定是被实践检验证明无效的理论，典型案例包括基于科斯定理的碳定价理论、<sup>③</sup> 后现代发展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等。

另一方面，虽然学理思辨机制能够驱动知识演化，但知识共同体可能会从事更加保守的活动来阻滞知识体系的全面演化。这类保守活动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延续原有理论或思想传统，通过修补理论而非颠覆性创新的方式使理论回应现实。这与拉卡托斯所讨论的围绕保护带而非硬核的知识创新活动相类似。这种活动有利于研究纲领的强化而非颠覆。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认为，有一类知识生产活动是一种不断用理论和概念去支持既有主导性知识的过程，这种知识生产虽然产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但并不质疑主导性知识的假设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sup>④</sup> 如果知识共同体参加以修补既有主流理论为宗旨的学理思辨活动，知识体系演化将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

总之，学理思辨机制虽然不能代替实践在检验和塑造理论方面的根本性作用，但可以引导知识共同体对实践的解读。因此，实践中出现的治理失灵现象是否意味着既有治理理论的失败？<sup>⑤</sup> 如果是，该理论创新应该转向哪个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实践反馈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需要经由学理思辨机制进行理论塑造。同时，这种理论塑造有时候会扭曲现实并产生对实践的错误解读，这种现象可被称为“学理滤

<sup>①</sup>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p. 725-753.

<sup>②</sup> 田野：《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概念创新》，载《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第29—40页。

<sup>③</sup> 吴健、马中：《科斯定理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理论贡献》，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1—25页。

<sup>④</sup>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p. 128-130.

<sup>⑤</sup> Jacqueline Best, "When Crises Are Failures: Contested Metric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0, No. 1, 2016, pp. 39-55.

镜”效应。此外，知识共同体毕竟不是全球治理具体政策、规则和方案的最终制定者，其生产的知识在上升为全球治理知识的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政策共同体的认可和采纳。

### 3. 权威重构机制

如前文所述，虽然全球治理应该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包容性的权威分配，但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议题。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各部分与某些全球治理权威所有者紧密关联。知识能够强化全球治理决策者（尤其是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威，而权威也会影响政策共同体对知识的选择。作为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重要驱动力，权威重构机制是指行为体通过争取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包括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非正式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等）来影响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机制。与现实主义理论讨论的权力博弈不同，权威重构的深层动机并不局限于狭隘的物质利益，还包括增强全球治理权责分配公正性的动机。权威重构机制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产生了两种影响。

第一，权威重构能直接引发知识创新行动。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性知识大多伴随大国崛起及其全球使命的扩张而产生。与之对照，崛起国在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时一般会从秩序观入手建构一些理念层面的替代方案。<sup>①</sup> 如果将这一知识生产逻辑应用到全球治理知识，就会发现那些试图获取更大权威的行为体只要产生提供替代知识的想法，便能推动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创新。较为简单的操作方法是，从逻辑上将关于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主导性表述颠倒过来，形成一系列“不是……”“反对……”等否定性表述。显然，此种创新逻辑对权威所有者和相关概念的要求极高，而对知识的理论性、论据和逻辑性的要求相对较低。随着知识创新的深入，权威所有者也可以借鉴实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这两大反思性机制产生的知识进一步重塑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当然，由于传统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具有模糊性和较为广泛的兼容性，因此反思性机制也无法彻底将其驳倒。由于新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往往包含着新的价值取向，知识变革对于传统权威所有者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并需要它们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因此，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演化并不能由反思性机制直接推动。例如对低碳转型的新认识以及对发展的重新定义等此类对全球治理愿景的创新性想象，在其产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缺乏权威所有者的支持而被高度边缘化，它们只能借着政策共同体内权威重构的契机才能产生全球

<sup>①</sup>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pp. 41-72.

性影响力。

第二，权威重构机制对学理性和实践性更强的治理理论演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治理理论演化的基础性动力是实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两者作用的叠加，虽然政策共同体无法对此加以控制，但权威重构机制仍然可以产生三种效应：其一，如果权威重构机制根本性地改变了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且这些改变足以重塑治理绩效的评判标准，则可以借助实践反馈机制来影响理论创新。其二，新权威所有者可以改变知识生产的议程，如大国可以要求国际组织开展关于特定问题的研究，进而显著增强该议程内知识的影响力。当然，这种能力并非大国专属，拥有权威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其三，权威所有者可以对理论进行筛选，即通过强制命令、调整人员配置和控制资金调配等手段控制重要国际组织和知识生产平台（如智库和期刊等），将经过反思性机制生产出来的知识进行有选择的认证、综合、数据化和置换等。经过这些操作，权威所有者可以仅允许那些反映其实际利益、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治理理论得到推广并融入全球治理实践。<sup>①</sup>从改革者的视角来说，如果要推动新治理理论获得全球性影响力，则需要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sup>②</sup>当然，这种筛选机制不可能超越实践反馈机制对治理理论的根本性影响。即便没有权威所有者的支持，只要这些治理理论契合实践的需求就能产生积极的治理绩效，待权威重构进程开启后，此类理论知识就有机会上升为全球层面的治理理论。

#### 4. 综合性框架

前文分别讨论了实践反馈机制、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的驱动作用以及各自的内涵、运行原理和影响力限度，将这些内容进行有机组合后便可得到一个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该框架包含五方面内容：其一，全球治理的愿景和方法论更多反映了全球治理中权威所有者的利益和价值，其演化会首先被权威重构机制驱动。与之相对照，反思性机制无法直接作用于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政策共同体在没有发生内部权威改变时很难接受关于治理目标和方法论的创新。其二，全球治理理论的演化同时受到三大变革动力机制的驱动。实

<sup>①</sup> Karena Shaw, "Whose Knowledge for Wha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2003, pp. 199-221; Rianne Mahon and Stephen McBride, "Standardizing and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The Role of the OECD in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2009, pp. 83-101; 汤蓓:《国际组织知识生产的困境与改善》,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年2月11日。

<sup>②</sup> 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年第10期, 第105—129页。

实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共同构成治理理论演化的基础性动力，本文将二者合称为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实践反馈机制虽然是变化和创新的源泉，但理论演化并不总是直接反映实践，而是会受学理思辨机制的引导，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学理滤镜”塑造的结果。其三，权威分配结构会干预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的理论建构效果。只有通过了大国或权威性国际组织技术官僚的系统筛选，并被认为有利于巩固其权威的治理理论才会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指导性理论。其四，如果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变革达到了可以重塑治理实践绩效评判标准的程度，也会对治理理论产生间接影响。其五，如果能得到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的支持，作为边缘性知识的新治理理论可以与主导性治理理论并存，但只有在既有权权威分配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新治理理论才有可能从全球治理实践的边缘走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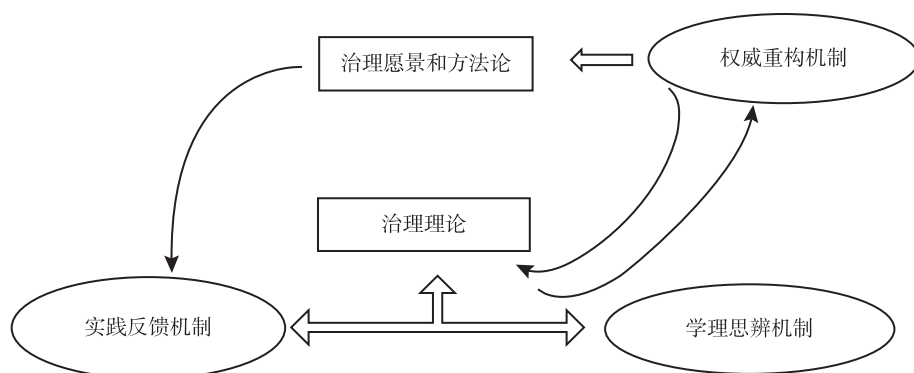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直接推动作用，→表示干预性和间接性影响。方框为知识体系组成部分，椭圆形为变革动力机制。

#### 四、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

国际发展治理是指国际社会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条件为目的而开展的以资金、技术和人员等为代表的公共资源的转移活动。国际发展治理的目标和行动具有全球性，国际发展治理事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规则的制定，因此该议题属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范畴。需要说明的是，全球治理概念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被正式提出，但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全球治理实践要早于该概念

的提出时间。如果要追踪某个议题领域内全球治理知识的演化,则需要将其起点设置在相关实践产生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发展治理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sup>①</sup> 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欧美国家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还通过各类专业机构生产了关于什么是发展治理愿景、何为发展治理方法论以及如何促进落后国家发展三大问题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集合。<sup>②</sup> 尽管经历了时势变迁,但国际发展治理议题中的治理愿景和治理方法论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促进理论虽然经历了几轮更新,但仍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事业,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中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正在被重塑,发展促进理论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 (一) 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化

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华盛顿共识”为政策载体,以西方中心主义、干涉主义合作原则以及市场与制度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元素是构成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sup>③</sup> 这套知识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定型,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补和迭代,直接指导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有条件援助活动。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是一系列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具体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设定了国际发展治理愿景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底色和治理方法论的不平等,二是结构主义的发展促进理论遭到了实践的冲击,三是古典经济学思想传统被再次塑造,四是西方形成了对权威的垄断。这四方面的条件共同支持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的主导性地位。

诞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的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是欧美国家建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基石。现代化知识体系涵盖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治理愿景方面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将其操作化为经济增长;二是在治理方法论方面将西方描绘为所谓“发展导师”,确立了援助者与受援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三是在治理理论方面认为发展是阶段性和线性的,强调落后地区应融入国际

① 丁韶彬:《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46—47页。

② 广义的发展知识既包括对欧洲自身发展逻辑的理论认识,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促进理论,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类发展知识,原因在于其与全球治理联系最为紧密。相关讨论参见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6页。

③ John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Law and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 Vol. 15, No. 1, 2009, pp. 7-21; 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sup>①</sup>

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生成是欧美国家自身发展实践、“学理滤镜”和东西方权力竞争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因有三点：其一，欧洲自18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实践以及欧美人类学家在“落后”地区观察到的一些因融入外部世界而产生的线性和阶段性文明进化现象共同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sup>②</sup>其二，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方法主要是基于对西方自身的想象，并去除了西方发展实践中的一些重要经历（如殖民体系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这也体现了“学理滤镜”的强大影响。<sup>③</sup>其三，这套知识体系虽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该知识体系重在维持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例如，历史上英法殖民当局资助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支持殖民统治的强化。<sup>④</sup>又如，在美苏冷战背景下，美国学者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阐述现代化理论时使用了具有政治性色彩的“宣言”（manifesto）一词，<sup>⑤</sup>其目的就是找到一套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理论。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不断遭遇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学理维度，即学界不仅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观、对发展逻辑的表面化陈述及其过滤殖民历史的做法，<sup>⑥</sup>还尝试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建构替代性理论。<sup>⑦</sup>20世纪60年代，拉美地区的发展实践和反馈与现代化理论的承诺表现出明显的差距，这种现象成为学者建构依附理论的问题之源。<sup>⑧</sup>依附论批判了世界体系的剥削本质，

①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The Free Press, 1958; 许宝强、汪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MacMillan & Company, 1877;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pp. 111-397.

③ 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9页。

④ 李小云、徐秀丽、齐顾波：《反思发展研究：历史渊源、理论流派与国际前沿》，载《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155页；刘少楠、许亮：《“科学”与“政治”之间：20世纪国际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47—60页。

⑤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⑥ 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195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3, 1971, pp. 283-322.

⑦ 依附理论中的“依附”概念来自列宁的著作，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648页。

⑧ 参见 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塞尔索·富尔塔多著，徐亦行等译：《巴西经济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并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强调政府作用的观点在西方也得到了结构主义经济学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呼应，尽管他更多地从凯恩斯经济学中获得灵感。<sup>①</sup>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反殖民运动中加强了团结。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非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成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并改善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南方国家在多边机制中权力的提升引发了反新殖民主义研究的涌现。<sup>②</sup>尽管如此，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演化依然只是局部的。国际学界对现代化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内容仅局限于发展促进理论部分，并未尝试为现代化知识体系对治理愿景的想象以及其不平等的治理关系寻找替代品。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西方知识共同体得以继续炮制源于自身想象的新发展知识体系。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成立了一系列专职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的机构，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和英国的发展研究院等。大量的专业期刊也在该时期创刊，如《发展研究杂志》（1964年创刊）、《发展与变革》（1970年创刊）和《世界发展》（1973年创刊）等。这些机构和研究平台强化了西方的知识生产能力。

20世纪70—80年代，现代化知识体系在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延续性影响，结构主义发展促进理论得到的消极实践反馈以及东亚看似超越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经验共同为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兴起提供了动力，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实践层面，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陷入困境。发达国家陷入“滞胀”，而旨在解决美国通胀问题的“沃尔克冲击”却引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这两类实践反馈都使强调资本积累和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发展促进理论受到冲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东亚经济体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获得了远比拉美地区更好的发展成绩，这种情况也与结构主义的预期不符。二是在学理层面，早在结构主义饱受实践冲击之前，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开始不断壮大。<sup>③</sup>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学者的推动下，“芝加哥学派”不断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中汲取养分，发展出一系列推崇

<sup>①</sup> Willian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George Allen & Unwin, 1955.

<sup>②</sup>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Vol. 18, No. 4, 1966, pp. 4-17;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Thomas Nelson & Sons, 1965.

<sup>③</sup> “芝加哥学派”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参见 Steven G. Medema, "Identifying a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On the Origins, Diffusion, and Evolving Meanings of a Famous Name Bran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46, No. 2, 2024, pp. 169-200.

自由市场的发展主张,并将这种主张用计量模型加以包装。<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理论虽然对自由市场实践进行了部分总结,但没有如实反映西方在崛起过程中采用的大量非自由主义政策,因此该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深受“学理滤镜”的扭曲。<sup>②</sup>在结构主义失势的契机下,曾经在凯恩斯主义阴影下沦为边缘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并借机大幅提升了自身的学术地位。<sup>③</sup>“芝加哥学派”先在智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试验,<sup>④</sup>后来将“东亚奇迹”解读为一个自由主义得以成功的故事,<sup>⑤</sup>在政策界和学界进一步获得了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但从事后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在智利的实验还是在亚洲出现的“东亚奇迹”,两者很难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可见,新自由主义在当时已成为“主流”学界解读现实的强大滤镜。总之,在实践和学理机制的共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日益上升,如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则担任了拉美地区多国的金融政策顾问,甚至主导设计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促进理论同时还得到了西方国际政治权力的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掌权,他们共同发起了全面的自由化运动,削弱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强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sup>⑥</sup>在美国的压力和经济学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管理层和雇员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化倾向,致使这两大核心金融机构成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的坚定执行者。<sup>⑦</sup>1996年,世界银行更是将自身定义为“知识银行”,<sup>⑧</sup>进一步

① Lanny Ebenstein, *Chicag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 St. Martin's Press, 2015.

②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2002.

③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向智利输送经济人才并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这些人士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主导的智利政府中参与了早期的自由化实验。参见 Sebastian Edwards, *The Chile Project: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ys and the Downfall of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⑤ Robert Wade, "What Can Economics Learn from East Asian Succes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05, No. 1, 1989, p. 70.

⑥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⑦ Jeffrey M.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p. 147-186; Sarah Babb,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Transnational Policy Paradigm: Its Origins, Trajectory and Likely Success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2013, pp. 268-297.

⑧ World Bank, "World Bank Group Timeline (1996)," <https://timeline.worldbank.org/en/timeline/home?years=1996#event-president-james-wolfensohn-proposes-knowledge-bank>.

强化了西方对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的控制。与此同时，以结构调整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发展治理政策反过来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力量。总之，在实践机制、学理机制和权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原本强调以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核心的发展促进方案逐渐被边缘化，相关方又退回到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早已铺就的思维方式中，将发展不足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情况。<sup>①</sup>

由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与国际发展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实践反馈产生的影响随之被放大。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贷款项目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实践绩效并不理想，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使相关国家更容易遭受金融冲击，导致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逐渐衰减。<sup>②</sup> 面对实践的冲击，由于没有竞争性知识共同体和政策共同体可以提供有影响力的替代性知识体系，以自由主义者为主的西方知识共同体只能采用叠加和增补的方式对既有知识体系进行修补。西方知识共同体虽然先后引入了制度主义、“良治”和社会资本等概念，但这些都强调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服务市场。有学者因此认为，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更包容的《减贫战略文件》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赋权理论的叠加。<sup>③</sup> 世界银行在编撰各类报告时也要求加强对“非自由主义发展知识”进行审核。<sup>④</sup> 这种理论修补方式既反映了传统思想对创新的抑制，又体现了权力的特定需要。有学者指出，世界银行大肆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事实上已经偏离其原始意涵，其目的是方便自己设计以社会赋权为中心的贷款项目。<sup>⑤</sup>

综上，西方知识和政策共同体通过过滤自身发展经验生产出了一套异化的普遍性发展理论，这是西方生产发展知识的一种基本模式。<sup>⑥</sup> 尽管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存在许多内在缺陷，但由于诸多支持性力量的存在，该知识体系的诸多元素已成为西方知识共同体和政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并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① John Toye,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Blackwell, 1987.

② 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30—33页。

③ Arne Ruckert, “The Forgotten Dimens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radig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5, 2010, pp. 816–839.

④ Charis Enns, “Knowledges in Competition: Knowledge Discourse at the World Bank During the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Era,”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 15, No. 1, 2015, pp. 61–80.

⑤ Anthony Bebbingt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I: Can Bourdieu Travel to Policy?”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7, No. 2, 2007, pp. 155–162.

⑥ 李小云：《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8期，第93页。

## (二) 全球南方的兴起与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生成

进入 21 世纪, 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地贡献了新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在此背景下, 一系列非西方知识元素正逐步得到系统性开发, 推动了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生成,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 在治理愿景方面, 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对发展目标的描绘更加全面和多元。2015 年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强调了增长、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等目标, 使发展目标更加全面和平衡。中国也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治理愿景。这些目标在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都强调综合、包容、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二, 在治理方法论上, 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更强调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中国将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设定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之下, 积极与各国进行发展战略对接,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sup>①</sup> 这种更加扁平化的发展合作方法论正被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地运用于南南合作中,<sup>②</sup> 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呼应。第三, 在治理理论方面, 一些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命题被创新性地提出并付诸实践, 如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新结构经济学、<sup>③</sup> 经济特区的发展促进功能、<sup>④</sup> 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功能<sup>⑤</sup>以及渐进改革的发展促进功能等。<sup>⑥</sup> 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 中国学者更愿意将自身的国际发展治理实践总结为平行经验分享和发展引导, 主张要因地制宜和根据自身国情, 强调文明互鉴和融合模式。<sup>⑦</sup>

由此可见, 非西方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已经在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层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并在治理理论的建构方面呈现多元化趋势。驱动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生成的动力逻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① 孙吉胜:《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2期,第24页。

② Charles Gore, “The New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Landscape: Actors, Approaches,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5, No. 6, 2013, pp. 769–786.

③ 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48—153页。

④ Yitao Tao and Zhiguo Lu,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Springer, 2018.

⑤ 李平、王春晖、于国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载《世界经济》,2011年第5期,第93—116页。

⑥ 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pp. 1–48.

⑦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潘亚玲:《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92—110页。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在争取权威重构方面的努力是建构革新性治理愿景的首要推动力。进入 21 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总量、贸易份额、发展融资额和构建合作平台数量等方面已经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sup>①</sup> 这激发了更强的权威重构诉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开放的设计过程进一步激发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热情，使这些国家不断提出挑战西方“主流”话语的新主张，批评西方发展观缺乏公平性，存在将环境与发展进行割裂的缺陷。<sup>②</sup> 同时，学理思辨机制也有利于治理愿景的革新。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批判发展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的阴影下不断发展。有学者从物质主义发展观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如阿图罗·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提出了批判发展理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发展的定义进行了人本主义扩展。<sup>③</sup> 在这些新理论的基础上，全球南方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也更加系统全面，且更具发展中国家特色。例如，全球南方国家更强调发展与环境的平衡，更突出发达国家的义务，反对借环境治理来牺牲发展。<sup>④</sup> 这些概念为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人本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反思性知识创新活动非常重要，但权威重构机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首要 and 直接推动力。批判主义、人本主义和后发展理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颇为流行，但这些思想并未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产生变革性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进过程中贡献了诸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如政策话语中的“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以及学术话语中的“天下体系”等概念。中国对国际发展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建构具有深厚的思想积淀。在治理愿景方面，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方法论方面，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可以追溯至 1964 年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sup>⑤</sup> 强调的是无附加条件、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核心观念，与西方的援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创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的

① 徐秀丽、马俊乐：《从万隆会议到“全球南方”崛起：国际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载《西亚非洲》，2025 年第 2 期，第 27—43 页。

② Sakiko Fukuda-Parr and Bhumi Muchhala, “The Southern Origi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deas, Actors, Aspir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26, 2020, pp. 1–11.

③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Alfred A. Knopf, 2000.

④ Sakiko Fukuda-Parr and Bhumi Muchhala, “The Southern Origi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deas, Actors, Aspirations,” pp. 5–6.

⑤ 1964 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思想之锚。<sup>①</sup>

第二，中国在治理理论方面已成为国际发展治理领域重要知识的提供者。中国开展治理理论创新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国的发展为新发展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实践和产业发展政策等为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注入了新的内涵。<sup>②</sup>二是相关学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努力，尝试提炼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其中具有典型学理思辨性成果是关于政府和市场两者紧密合作关系的研究。<sup>③</sup>三是中国学者在理论推广方面采取了一些独特做法。对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西方垄断国际发展治理权威的背景下，西方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会不加思辨地将裁剪和美化后的西方式发展促进理论兜售给发展中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知识界与政策界的学者和专家更加注重实践和体验，并未像西方发展经济学学者那样追求普遍化和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建构。<sup>④</sup>此外，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的知识生产模式与实践模式，中国在国际发展治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强调包容性、不干涉和合作共赢等原则。对这些原则的维护成为检验中国国际发展治理实践绩效的标准。<sup>⑤</sup>自2013年以来，中国发起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与国际发展治理相关的倡议和行动，还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知识生产机构，积极主动开展关于发展知识的传播和互鉴工作。<sup>⑥</sup>这些行动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发展领域的国际权威，扩大中国知识和中国方案的传播范围，同时保证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包容性。<sup>⑦</sup>

① 张海冰：《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第93页；罗建波：《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理论、经验与世界意义》，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第39—63页；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33—43页。

② 燕继荣：《发展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创新》，载佟德志主编：《政治学评论》（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页；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③ 陈玮：《“发展型国家”的三次理论辩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时机》，载《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1期，第55—71页；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4—20页；郑永年、黄彦杰著，邱道隆译：《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④ 李小云：《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8期，第93页。

⑤ Bowen Yu, “Cognitive Evolut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4, 2021, pp. 481–505.

⑥ 黄梅波、朱丹丹：《知识合作在国际发展治理援助中的作用》，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21—27页。

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f692402b5b3b21154f103ee64c0c551d-0070012022/original/Poverty-Synthesis-Report-cn.pdf>; Rolf Schwarz and Marina Rudyak, “Chin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orking Paper, No. 113, Paris, OECD Publishing, December 2023.

表 1 总结了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及其复合动力。就国际发展促进理论而言，国际发展治理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议题领域，因此相关理论的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相关国家实施的政策在这类理论指导下能否有效解决特定的发展问题。同时，以理论创新为目的的相关学理性争论及其结果也为知识共同体对实践的解读提供了方向性指引。除这两种驱动力外，权威所有者还对具体有哪些理论能够获得全球性影响力的议题进行了“筛选”。就治理愿景和方法论而言，由于西方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与西方先发优势相互结合，使得西方中心主义和不平等的国际发展治理愿景以及方法论根深蒂固，只有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权威得到较大提升的条件下，这种局面才会被逐渐扭转。

表 1 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及其动力机制

知识体系演化轨迹	变化的要点	学理思辨	实践反馈	权威重构
现代化→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不变，理论发生变化	围绕西方和体系的作用、线性发展观等问题产生辩论，受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拉美国家）的持续欠发展状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博弈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不变，理论变化	围绕体系和政府等维度产生辩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学	智利的实验以及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初步解读	巩固了西方大国保守势力的权力优势和世界银行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内部修补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不变，理论修补式渐变	对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自由主义改造	结构调整，发展援助的失灵	无权威重构，主要由西方主导
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新发展知识体系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革新，理论多元化	以批判理论、人本主义发展理论和新合作原则等新观念重塑发展观和南北关系，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生辩论，对一般化知识生产持审慎态度	对东亚发展模式的再解读以及对对中国经验的理论化	中国、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权威重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五、结论

随着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入，知识创新和推广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讨论知识创新的研究，但没有系统地对知识演化的逻辑进行理论化分析。本文聚焦全球治理问题，首先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细分为治理愿景、治理方法论和治理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并依据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各部分的特点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演化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没有实践的知识创新是无源之水，知识虽然源于实践但经常受“学理滤镜”的塑造，新旧知识的更替需要政治机遇，治理权威对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方面的知识生产能够发挥直接作用并间接影响治理理论的演变。

本文的实证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国际发展治理领域，但相关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气候、金融和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领域。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话语表述中出现了净零排放以及“去碳化”等新概念，而气候治理理论从最初强调强制性的国家行动转变为强调系统性和市场化的低碳转型，体现了气候治理在实践、学理和权威结构方面的变化。又如，全球金融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进程非常缓慢，这反映了西方的强势与非西方替代性实践和学理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再如，在安全领域，在非洲联盟的领导下，非洲国家正立足本土实践，尝试提炼出一套非洲特色的集体安全理论，但这一努力受到政治权威不足、知识共同体内部分歧等因素的制约。<sup>①</sup>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知识的重要生产者和贡献者，未来可从四方面补充和完善非西方全球治理知识生产的条件：一是加强对治理实践的总结，可投入更多学术力量将中国的治理经验与全球治理实践相结合，促使相关概念、理念和成功实践进一步理论化；二是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促进全球治理知识的生产，保持中国知识与世界知识的兼收并蓄；三是继续提升和强化中国相关机构以及南南合作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与影响力，加强知识传播机制，促进跨国学术交流；四是保持知识的包容性和弹性，适时进行动态调整，保持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和活力。

（截稿：2025年7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

<sup>①</sup> 罗建波、孙欣：《“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5期，第103—133页。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Knowledge Systems****YU Bowen (24)**

【Abstract】 The global governance knowledge system comprises three integral components: governance visions, governance methodologies, and governance theories, exhibiting three key features of practical relevance, theoretical rigor, and normative orient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is knowledge system is driven by three interrelated mechanisms: practical feedback,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authority reconstruction. The practical feedback mechanism directly te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theories and offers experiential insights that inform and catalyz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mechanism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through argumentation, conceptual importation, and theoretical synthesis. The authority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not only generates new governance visions and methodologies but also reshapes the standing of governance theories within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s. While practical feedback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perate as reflexive mechanisms, their influence on governance visions and methodologies must be mediated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is primarily shaped by these reflexive mechanisms; however, shifts in visions and methodologies—driven by authority reconstruction—can alter the evaluative criteria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reby indirectly influencing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 a case to demonstrate the logic underpinning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knowledge. It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from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to the neoliberal knowledge system, and examines the Global South's efforts to advance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words】 knowledge system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oliberalism, Global South

【Author】 YU Bowe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Compelled Convergence While Seeking Divergence: South-North Policy Diffusion in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CHEN Zhaoyuan (48)**

【Abstract】 South-North relations profoundly shape the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become more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and leading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visible, which warrants close attention and urgent theoretical inquiry. To examine whether and how South-North policy diffusion